



# 防治林业有害生物 是一场持久战

本报记者 张雪

□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危害的形势十分严峻,年均成灾面积占林业总灾面积的50.69%,是森林火灾面积的数十倍

□ 要把林业有害生物纳入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更完整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角度去认识、去防治

□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要变被动为主动,变救灾为防灾,将重心、重点放在预防上,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关口前移

我国是世界上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危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林业有害生物的危害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潜伏性、暴发性及毁灭性。目前,我国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危害的形势十分严峻,年均成灾面积占林业总灾面积的50.69%,是森林火灾面积的数十倍,年均造成损失高达1101亿元,且呈现出传播扩散迅速、控制难度加大、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加速且危害加重的态势。特别是外来有害生物几乎每年入侵1种,年均造成的损失约占林业有害生物全部损失的64%,栎树猝死病、白蜡树枯梢病等国外重大植物疫病传入风险极高,加上舞毒蛾、光肩星天牛等本土有害生物,影响着我国每年上亿美元货物的出口,林业有害生物对我国林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严重威胁。

今年6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要求,提升灾害预防能力、预警监测能力、源头监管能力、应急防治能力和防治社会化程度;解决防治资金投入渠道窄、地方政府防治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增强防治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防治检疫组织建设;破解现有扶持政策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行业的落实瓶颈,并完善相关法规,提高科技支撑能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的防治职责,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健全联防联控机制。

我国已经明确了防治林业有害生物的具体目标:到2020年,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疫御灾、防治减灾体系全面建成,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4%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85%以上,测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种苗产地检率达到100%。

为了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提出,要把林业有害生物纳入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从更长时间跨度和更完整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角度去认识、去防治,不能就虫论虫、就病论病;防治工作要变被动为主动,变救灾为防灾,将重心和重点放在预防上,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关口前移;要完善监测预警机制,确保“防早、防小”、“治早、治小”;要加强源头管理,严防疫情传播扩散;要提高应急防治能力,减轻灾害损失;要积极创新防治机制,大力推进社会化防治进程;要增强科技支撑能力,实行科学防治;要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强化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健全防治目标责任制。



隆平高科长沙生物技术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水稻DNA加样情况。

该实验室主要从事分子辅助育种、双单倍体培养、米质分析等。传统育种是在田间凭经验、碰运气来选育新品种,分子辅助育种实验室利用分子标记技术,帮助育种专家按计划、有目的地育种。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 育种是为了播种

## ——种业改革深度调研(下)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新一轮种业改革令人关注,核心就是要逐步确立企业商业化育种的主体地位。湖南是全国最早推动商业化育种的省份之一,这里有亚洲最大的种业企业隆平高科,也有省部共建的育种平台华智生物公司,还有众多充满活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企。湖南进行商业化育种对我国其他地方有何借鉴意义?记者来到湖南进行调研。

### 种企为谁育种

见到杨远柱的时候,他正在隆平高科长沙关山基地,进行水稻不育系花粉育性鉴定。15年前,杨远柱从湖南省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位置辞职,投身企业。如今,他已是隆平高科副总裁兼种业科学院院长。他回忆,在农科所的时候,一个单位多课题,一个育种专家带3至5个人参与到育种的所有环节,课题之间、单位之间重复着同样的研究。农科所育种周期长、效率低,被称为“家庭作坊式”育种。

“这种课题式育种,育种目标大多是专家根据科技主管部门下达的项目指南或个人喜好而定,并非根据市场和产业需要。选育出很多好看却不中用的品种,这些品种技术指标很高,商业化开发价值却很低。”杨远柱说,有的水稻育种课题要求3年内选育增产10%以上的品种,但不明确在什么条件下增产10%以上,且对抗病性、耐逆性等不作明确要求,也不关心品种的商业化价值。

杨远柱认为,商业化育种的目标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和产业需求。长江流域一季稻种植面积在1.2亿亩以上,一季稻种子利润率相对较高。因此,隆平高科种业科学院重点育种方向就是一季稻。杨远柱以前的研发优势在杂交早稻领域,2007年,他对研究方向进行了调整,重点突破杂交一季稻。通过7年的努力,他选育出“隆两优”、“晶两优”两大系列优质高产杂交中稻组合。

据了解,隆平高科专门设有育种方向决策委员会,研发人员占三分之一,公司决策层、生产人员和销售人员占三分之二。湖南省种子管理局局长周志魁说,种子企业成立由科研、生产、营销等人员组成的品种选育决策委员会,综合生产特点、经济性状、消费者需求等指标确定育种目标,选育什么样的品种,要综合市场需求、产业需要、消费者喜爱等因素确定。

### 团队如何育种

商业化育种讲究团队作战和资源共享,科研人员就是一颗颗螺丝钉。杨远柱认为,商业化育种把育种的各环节分解,就像汽车企业一样,不同的车间制造不同的零件,最后进行组装,真正实现“大规模、高通量、标准化”育种。

“去年,不育系选育组新定型120个不育系株系,恢复系选育组新定型100余个恢复系株系。我把这些新亲本交给

组合测配组,要求他们配制1万个以上新组合。今年中试部对这些新组合进行优势鉴定和抗性鉴定,从中筛选出符合育种目标的优异组合,然后把优异组合的亲本交给小面积制种组,生产出合格的种子,再将合格种子交给中试部,安排在不同的区域育种站进行品种测试。”杨远柱介绍说。

采访中,不少种企表示正在积极吸引科研院所的人才加盟,但也存在一些科研人员不适应企业的情况。隆平高科产业总监龙和平说,企业工作量大,1个人负责的头头往往是科研院所的几倍。有些从事事业单位过来的育种人员,会因不适应企业的工作节奏和育种观念而选择离开。

周志魁说,在育种方式上,湖南种业已从单个育种人员负责筛选、配种、品比等选育全过程向工厂化育种转变。从事科研育种的人员进行内部分工,有的负责亲本选育,有的负责配组,有的负责品种测试,各个环节密切配合,组成一个商业化育种体系。

### 育种怎样创新

“我国从事农业基础研究的人数居世界第一,传统育种科研人员超过20万人。”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说,我国农业基础研究和传统育种水平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之所以没能创造出世界一流的种业,关键在于我国大多是靠经验育种,分子育种技术落后,生物技术研发平台缺失。

华智公司是由农业部重点支持、国内多家水稻种业骨干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水稻分子育种平台,去年落户湖南,为广大种企提供包括分子育种技术、种质资源创新、品种测试与评估等方面的服务。农业部鼓励华智公司从国外引进高端人才,全面整合人才、技术、资源等科技要素。今年3月,有16年国际种企工作经验的张健回国就任公司总经理。

“我国种企普遍规模较小,单个企业无力承担持续高强度的分子育种技术开发与投入,种企共建分子育种技术开发平台是很好的办法。”张健说,平台将使传统的经验育种模式与分子育种相结合,可由表及里地辨别出控制植株外表性状的基因,精准快捷地进行育种。

多位育种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科研院所对育种理论与方法创新、种质资源创新和种业关键技术的研究还不能满足种企商业化育种的需要,对整个行业育种的支撑力度明显不够。我国长期保存的42万份种质资源中,开展了抗病、抗逆等重要农艺性状鉴定的资源只有30%,育种种质资源的原始创新少,有利用价值的新基因匮乏。

农业部种子局副局长廖西元说,要加强育种理论、技术、方法、材料创新。借鉴发达国家种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转变育种理念和思路,充分利用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和方法,逐步改造传统育种,加大种质资源深度鉴定和评价力度,创制优异育种材料,切实提升育种水平。

## 连线

### 江苏宜兴:

## 机制新 河水清

本报记者 杜芳 通讯员 史志强

前不久,江苏宜兴农村河道长效管理季考结果“出炉”。拿着成绩单,该市万石镇农户李建卫一脸笑容,因为他“承包”的河道在几次抽检中均是优秀。他告诉记者,通过治水,农村的生活污水实现了集中处理,河水变清了。

宜兴位于长江流域的下游,太湖上游,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爆发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宜兴被推到治理太湖的最前沿。宜兴境内有9条河流直通太湖,河道综合整治首当其冲。

“河长制”是宜兴在综合整治河道中的创新之举。宜兴将全市3699条河流全部“承包”给各级党政领导,由他们担任“河长”,“河长”完成河道整治任务的情况纳入政绩考核。随着“河长制”的层层推进,社会力量也被带动起来。宜兴沿河、沿湖的企业主动放弃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力求通过清洁生产来实现企业发展。

近年来,宜兴将“河长制”进行升级。李建卫从事河道疏浚工作已近10年。他在工作中发现,宜兴各地对河道管理通常采取分段管理的模式,不仅花费大,且存在一定盲区。去年10月,在相关政府部门支持下,李建卫联合周边农户,成立了江苏首家河道综合管理专业合作社。

除了创新河道治理模式,宜兴还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治水举措。宜兴为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建立农虫测报网络,禁用甲胺磷等18种高毒高残留农药;深入开展小化工、琉璃瓦、水泥立窑等专项整治行动,累计关停化工企业575家、琉璃瓦企业404家、铸造企业65家;对全市环境基础设施实行统一规划、管理,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11座、污水管网1300多公里。

### 贵州普定:

## 土地流转经营权

## 可用以抵押贷款

本报记者 吴秉泽

日前,贵州省普定县向思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放了全省第一本《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证》,思源公司以土地流转经营权作抵押,获得普定县农村信用联社900万元贷款。

为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缺乏的困境,普定县以土地流转经营权确权颁证为切入点,选择1至2户实力相对雄厚、产业示范效果明显、有贷款需求且有偿还能力的农业企业作为试点,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

在借鉴其它地方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普定县制定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建立了三级土地流转服务管理机构,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程序。据了解,普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以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需经过合同签订、确权颁证、价值评估、发放贷款等程序。

下一步,普定县将扩大土地流转经营权的确权颁证和抵押贷款试点范围,并以此为突破口,建立完善农村资产抵押登记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and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等,推动农村各项改革有机衔接、相互促进。



山西省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由于古村形态、风貌格局、庙宇建筑、居民院落保存完好,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随着该村入选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试点,人们纷纷来张壁村体会乡村民俗。上图为该村一角。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上图为河北省滦平县尚亚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监测蔬菜长势。该合作社将气象数据自动监测系统先进设备安装到社员蔬菜大棚里,提高了合作社种植蔬菜水平。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 针对“村官腐败”的成因着力遏制

瞿长福

□ “村官腐败”发生在村里,但有时候根子并不在村里

□ 当务之急要强化各级组织的法律监督和责任监督,避免腐败在乡村遍地滋生

□ 长远看,根治“村官腐败”在于完善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最近,“村官腐败”问题引人关注。据有关机构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元。这些频现的“村官大腐”、千万级乃至上亿级“村官大案”,在引起公众热议的同时更令人深思。如何才能从根子上防治“村官腐败”?

讨论防治“村官腐败”问题,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村官”具体指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目前农村现状,“村官”就是“村两委”成员,即农村党支部成员和村民委员会成员,其中,多数“问题村官”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搞清“村官”身份,对分析“村官腐败”发生的原因非常重要。

从这些年农村实践来看,导致“村官腐败”的原因很多,

也很复杂。仅从利益诱惑来看,就涉及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款物,还有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及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工程及厂房的出租、转让、发包等许多方面,如果私欲当头,又缺乏监督,每个方面都可能出现猫儿腻。

不过,无论原因多么复杂,透过表象来看,导致“村官腐败”的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内部监督力度减弱或者缺失。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接受全体村民监督。但当前的现实是,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村里留下来的基本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受各种因素影响,这些留守人员没有能力、没有精力,不知道也不愿意去行使监督权。加上一些地方家族势力、宗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的存在,村民监督更加弱化,这就使少数素质不高的“村官”有了贪腐条件。

内部监督乏力还有一种表现:在许多地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成了“一肩挑”,这虽在某种程度上对推动农村工作快速展开有一定作用,在村民自治比较成熟的地方可以推行,但这种结构使本来在组织程序上可以相互监督的“两委成员”在身份上模糊了,尤其是当自律性差、素质差的人权力独揽之后,更容易形成“一言堂”,使内部监督形同虚设。

“村官腐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外部监督缺失或者不到

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村委会成员要实行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由乡镇和县级有关部门负责;村民对村委会不履职的情况可以向乡镇和县级有关部门反映。但现实生活中,一些农村村务基本不公开,村民难以监督;审计时乡镇和县又基本没有精力,村里账目最终成了一笔糊涂账。

外部监督乏力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村乡县存在利益纠葛。据统计,近几年“村官腐败”绝大多数与农地征占、宅基地拆迁等有关。现在各地建设项目很多,每一个项目都要涉及土地,基本就是农村集体土地。乡镇和县招商引资要用地、建园区要用地,怎么办?只能征转、流转农村土地,这就要与村委会拉关系,依靠村委会想办法。这时候,不仅外部监督审计弱化了,有些法律意识淡薄、私字当头的人还会趁机与村官相互勾结,腐败由此产生。

所以,“村官腐败”发生在村里,但有时候根子并不在村里。遏制“村官腐败”,需要强化乡镇和县各级组织的法律监督和责任监督,发现一起追究一起,避免腐败在乡村遍地滋生。从长远看,还在于推进完善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实行村民自治有很明确的规定,只要各地真正扎实地推进落实,就能从根本上遏制“村官”腐败的发生。



本版编辑 李亮